

工作单位性质与利用网络求职的差异性

社会
2009·2
Society
第29卷

来自珠三角农民工的实证研究

夏磊

摘要: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市场转型研究一直关注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其市场化程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的实证研究,发现伴随着职业流动的增加,农民工在求职中并没有减少对社会网络的使用,只是越来越少地使用先赋性的亲友网络,越来越多地使用在职业流动中新建的社会网络。本文的研究还发现,不同性质工作单位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影响了农民工对求职方式的选择。农民工进入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工作单位,可以较多地通过市场途径求职;进入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工作单位,则需要较多通过社会网络途径求职。

关键词:农民工 市场化 社会网络 工作单位¹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很多学者对人们在找工作过程中的求职途径作了大量的学术研究,认为通过社会网络求职是一种重要的求职途径(袁方,1992;卢汉龙,1997;李培林,2000;边燕杰,2001;赵延东,2005)。

在社会学领域,学者们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求职途径也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这些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社会

夏磊 中山大学社会学 硕士研究生

本文是蔡禾主持的200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批准号05&ZD034)和万向东主持的中山大学第2期“985计划”——“公共管理与社会发展”创新研究基地项目《制度缺失与市场供求决定的契合——外来人口非正式就业聚集研究》的成果之一,并得到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7年度项目《农民工非正式就业聚集研究——以广州为例》(批准号07H02)的资助。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刘林平教授的认真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 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将非正式就业也算作一种工作单位,即农民工的工作单位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个体户、非正式就业等几种类型。

网络的使用状况,关注他们在找工作过程中是通过“强关系”还是“弱关系”来获得信息或职位,关注求职者获得的职业地位与介绍人的职位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从传递城市就业信息到结伴同行中,还是在从进城后的初次职业流动到再次就业流动中,研究者都发现了求职者血缘、地缘网络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王毅杰、童星,2003)。

市场转型理论对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的研究还发现,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化程度是不同的,因此求职者进入不同性质工作单位的求职方式也是不同的。对于处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当中的农民工来说,进入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对社会网络的利用是否存在差异?是否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工作单位,农民工可以更多地通过市场的方式求职,而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工作单位,农民工则需要更多地通过社会网络的途径求职?本文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

二、文献回顾

在社会网络的研究中,关系网络对于求职者的帮助几乎已成定论,在对中国的经验研究中,这一点也反复地得到了证明(Granovette, 1974, 1995; Bian, 1997; Bian & Ang, 1997)。社会网络在职业流动中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对求职过程及其后果具有巨大的影响力(Fevre, 1992)。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1995)的研究表明,在求职过程中社会网络(而不是正式的市场渠道)具有比较重要的作用。

在实际的求职过程中,社会网络又分为先赋性的亲友网络和职业流动过程中新建的社会网络。美国学者在对个人求职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人们在求职过程中会越来越倾向于利用新建的社会网络,而不是先赋性的亲友网络。格兰诺维特(同上)对个人求职进行了实证研究,他发现对于求职者来说,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来自于具有较强异质性的一般朋友,而不是普遍认为的关系较为密切的亲友。林南将社会关系区分为先赋和建构两种,他认为随着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建构关系的作用会超过先赋关系(Lin, Ensel & Vaughn, 1981; Lin, 1982)。

在国内关于农民工的实证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重要性要高于其他群体(王奋宇、赵延东,2003)。王春光(2003)则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是农民工得以流动的主要社会机制。

刘林平(2001;2002)通过对深圳平江村的实地调查,认为平江人到深圳发展,靠的不是具有较充分的人力资本,或金融资本,而是充分地利用了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网络获得的。

虽然多数学者认为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先赋性的亲友网络和在流动过程中新建的社会网络孰轻孰重,不同的学者却有不同的看法。曹子玮(2001)通过对农民工的调查研究指出,农民工主要是通过社会网中的强关系来求职的,农民工的社会网中的支持网主要是初级关系。他认为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工的社会角色、空间位置、资源获取方式虽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他们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的初级关系仍然没有改变。李培林(1996)和赵树凯(1998)也指出,市场化的变革和农民职业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的依赖。

不过,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农民工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对社会网络的使用经历了从先赋性亲友网络到新建的以业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的转变。单菁菁(2007)认为进城农民工正在逐步建立起以业缘关系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纽带,并使之成为其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由进城农民工一手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正在成为他们在城市生活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本。王成斌(2004)认为农民外出就业的途径已从同质人群构成的初级社会网络拓展到由异质人群构成的次级社会网络。李汉林等(李汉林,2002;李汉林、王琦,2001)和渠敬东(2001)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城市里的农民工交往和社会支持基本上由强关系构成,其关系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推开;同时,农民工在城市也经历了学习和再社会化的过程,其中一部分扩展了弱关系。

关于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对先赋性的亲友网络的利用,以往的研究往往将农民工当作一个整体,由此得出对亲友网络利用增加或者减少的结论,但是在现实的就业中,这个整体是分为从事正式就业的农民工和从事非正式就业的农民工。万向东(2007)认为,相对于正式就业而言,非正式就业的概念可以进行如下界定:所谓非正式就业,是指具有非正式的雇佣关系、未进入政府征税和监管体系、就业性质和效果处于低层次和边缘地位的劳动就业。因此相比进入正规单位的正式就业来说,农民工进入非正式就业总体上是比较容易的,需要具备的条件非常低,农民工在进入非正式就业的时候也不需要太多地依靠先赋性的

亲友网络。农民工第一次进入正规的单位从事正式就业主要是依靠先赋性的亲友网络,但是由于在正式就业的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与用工单位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无法及时有效地获得关于用工单位的全部信息,因此在再次的求职过程中,农民工仍然需要通过先赋性的亲友网络获得劳动力市场中有限的用工信息(蔡昉,2005)。吴潇雯(2007)的研究也指出,在求职过程中是否利用“亲友介绍”会影响农民工就业类型的选择:越多地使用亲友网络途径求职,继续从事正式就业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意味着初次从事正式就业是使用亲友网络的,这对农民工来讲,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在以后的求职中会继续使用亲友网络。

市场转型理论认为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其市场化程度是不一样的。Liu 等人(2000)分析和比较了国有部门、城市集体部门和私营部门中的工资分配,并以此来估计市场化对工资差别的影响。他们认为,国有部门的市场化程度最低,私营部门的市场化程度最高。边燕杰等(Bian & Logan,1996)认为,在市场改革的同时,党的领导和城市单位制度仍然保持着,政治资本的回报仍然维持着。李春玲(2006)认为在不同的工业部门和企业机构中,存在着不同的就业类型、不平等的收入、福利待遇以及不同的职业提升阶梯。武中哲(2007)认为市场化改革后,“单位制”开始了变革的历程,但是制度的路径依赖广泛存在,“单位制”的因素和市场化的因素共同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作用。郑路(1999)认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原有体制中的单位分割效应既出现了一些松动又表现出了一定的延续性。刘精明(2006)认为转型期国有、集体企业的工资模式和人力资本收益模式,仍然较强地受到国家力量的规制和影响,而私有经济部门的工资定价过程则大多在市场交易中完成,较少受到来自国家的行政干涉。张文宏(2006)通过研究认为,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对关系资源的限制较少,而进入外资企业 and 人情资源的多少则没有关联。华尔德(1996)认为在中国国有的单位体制中,形成了工人对企业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依附、对工厂领导的政治依附和对直接领导的个人依附,因此在中国国有单位的再建构过程中,紧密的私人关系网络是其重要特征。汪和建(2006)也认为,关系在中国单位组织的建构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边燕杰(Bian,1997)通过对中国天津市的调研,强调了在由单位控制资源和机会的情况下,单位内部形成

了内部劳动力市场,因此社会关系网络对于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求职业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说明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研究者大多认为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程度仍然较低,而私营企业由于是改革的产物,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外资企业由于直接从国外引进,市场化程度最高。不同性质工作单位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影响了人们在求职过程中社会网络利用的差异性。国有企业由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因此求职者进入国有企业工作需要更多地依靠社会网络,尤其需要利用所求职的国有企业一些内部员工的关系,而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由于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在劳动力市场上较为规范和开放,求职者可以直接利用市场的途径求职。

不过已有的这些研究发现都是通过针对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实证研究得出的,那么对于身处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来说,不同性质工作单位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对他们的求职是否产生影响?如果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较多使用社会网络,那么他们在进入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工作单位时,在社会网络的使用上是否存在差异?

三、研究假设与方法选择

假设 1: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农民工对社会网络的利用并没有减少,只是越来越少地利用先赋性的亲友网络求职,越来越多地利用新建的社会网络求职。

农民工在职业流动的过程中对先赋性网络和新建的网络的利用是存在差异的,不能笼统地认为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更多地是依靠网络还是依靠市场求职。现实的情况也许农民工在职业流动过程中,会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与第一次进入打工场所时相比,他们应该掌握更多的用工单位的相关信息,同时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农民工也新建了一部分以业缘关系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网络。因此,随着农民工的不断流动,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可能越来越不需要利用先赋性的亲友网络,而更多地倾向于利用新建的社会网络求职。

假设 2:非正式就业者比正式就业者更少利用先赋性的亲友网络求职,且非正式就业者在职业流动过程中降低利用亲友网络的速度也要快于正式就业者。

假设 3: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其市场化程度的差异会影响到农民

工求职过程中社会网络使用的差异,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最低,农民工求职时需要较多依靠社会网络,甚至是企业的内部网络;外资企业市场化程度最高,农民工求职时主要依靠市场途径。

本文是基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蔡禾教授主持的 2005 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的调查数据进行撰写的。课题的问卷调查于 2006 年在广东珠江三角洲 9 个城市展开。调查对象被限定在“大专学历及以下的农村户口持有者跨县(区)流动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抽样方法采取的是比例抽样,即按人口普查中 9 个地级城市中流动人口比例分配各个城市的样本数,然后按广东统计年鉴中各个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控制调查对象在第二、第三产业中的分布。具体访问对象的获得是运用拦截方法和“滚雪球”的方法,最后获得有效样本 3 970 个,其中在企业打工的有效样本 3 084 个(其他为非正式就业)(参见表 1)。

表 1:样本基本情况描述

年龄(N= 3 970)	14-71 岁(均值为 29.58 岁)
就业类型(N= 3 973)	正式就业(77.7%),非正式就业(22.3%)
性别(N= 3 973)	女(44.7%),男(55.3%)
职业证书获得情况(N= 3 970)	有证书(18.2%),无证书(81.8%)
教育年限(N= 3 970)	5-15 年(均值为 9.11 年)
婚姻状况(N= 3 971)	未婚(46.7%),丧偶(0.8%),离婚(1.2%),已婚(51.3%)
工龄(N= 3 973)	0-36 年(均值为 6.26 年)
流动次数(N= 3 935)	0-20 次(均值为 1.90 次)
工种(N= 3 973)	生产工、其他普工、服务员(44.4%),技工(13.0%),企业管理人员(7.5%),非正式就业工种(22%),其他(13.1%)
企业性质(N= 3 973)	国有、集体企业(8.5%),私有企业(40.4%),外资企业(17.3%),个体户(7.0%),非正式就业(21.3%),其他(5.5%)
企业规模(N= 3 086)	9 人以下(10.0%),10-29 人(9.8%),30-99 人(15.7%),100-299 人(19.9%),300-999 人(18.1%),1 000-2 999 人(12.3%),3 000 人及以上(11.7%),其他(2.4%)
是否参加工会(N= 3 086)	参加(7.2%),没有参加(92.6%),其他(0.2%)

本文涉及到的相关变量如下:

1. 作为控制变量的个人基本人口特征变量

年龄;性别(男= 1,女= 0);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已婚= 1,未婚= 0);是否拥有职业证书(是= 1,否= 0);工龄。

2. 自变量

(1) 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次数(定距变量)。(2) 农民工的就业类型(正式就业= 0,非正式就业= 1)。(3) 农民工所在企业的性质:企业所有制(国有、集体企业= 0,私有企业= 1,外资企业= 2,个体户= 3);企业规模(9 人及以下= 0,10-29 人= 1,30-99 人= 2,100-299 人= 3,300-999 人= 4,1000-2999 人= 5,3000 人以上= 6)。(4) 农民工就业的工种(生产工、其他普工与服务员= 0,技工= 1,企业管理人员= 3,拾荒、捡废品者= 4,摩托车搭客者= 5,散工= 6,保姆、钟点工= 7,无牌照小店店主= 8,流动摊贩= 9,其他= 10)。(5) 在企业工作的农民工是否参加了工会(参加= 0,没有参加= 1)。

3. 因变量为求职过程中对网络的使用状况,分为五种

(1) 是否通过网络求职(是= 1,否= 0)。(2) 是否通过原先的亲友网络求职(是= 1,否= 0)。(3) 是否通过新建的企业内部网络求职(是= 1,否= 0)。(4) 是否利用网络获得信息(是= 1,否= 0)。(5) 是否利用网络直接安排进企业(是= 1,否= 0)(参见表 2、表 3)。

笔者通过二分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见表 4),首先分析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次数以及职业流动次数与就业类型的交互作用在社会网络利用方面存在的差异,然后再探讨农民工进入不同的工作单位在社会网络利用上存在的差异。

表 2:找工作过程中网络使用情况 (%)

	是否通过网络求职 (N= 3 973)	是否通过原先的亲友 网络求职(N= 3 973)	是否通过新建的企业 内部网络求职(N= 3 086)
是	85.80	54.70	43.30
否	14.20	43.70	56.7

表 3:找工作过程中获得网络帮助的内容 (%)

	提供信息 (N= 3 973)	介绍关系 (N= 3 973)	陪同见工 (N= 3 973)	直接安排进 企业(N= 3 086)
是	78.30	66.70	44.50	43.40
否	21.70	33.30	55.50	56.60

四、结果分析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职业流动次数会影响到不同类型网络的使用。对于一般性使用网络来说,职业流动次数的作用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农民工并没有减少对社会网络的使用,但是随着职业流动次数的增多,在求职过程中对先赋性的亲友网络的使用会越来越少,而对新建的社会网络(主要指以业缘为基础形成的企业内部网络)的使用会越来越多。农民工在城市每多流动一次,其在求职过程中利用亲友网络则只是原先的 95%,但对新建的企业内部网络的使用则是原先的 1.04 倍。由此,假设 1 得到了经验数据的证实。

模型二的结果显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差异对求职方式的选择具有显著性的作用。在非正式就业中,拾荒与捡废品者、摩托车搭客者、散工、流动摊贩等利用社会网络求职的比例只是正式就业中的生产工、其他普工与服务员的 46%、50%、73% 和 68%,如果不考虑显著性检验,则保姆、钟点工、无牌小店业主等非正式就业者使用社会网络的比例也低于正式就业中的生产工、其他普工与服务员。以上说明,总体上来说非正式就业者更多的是通过市场,而不是通过亲友网络的方式求职的。此外,职业流动次数对农民工求职方式的影响在正式就业者和非正式就业者这两者之间是存在显著性差异的。相对于正式就业者来说,非正式就业者每增加一次职业流动的经历,他对亲友网络的使用只是上一次的 87%。因此,非正式就业者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多,通过市场方式求职的可能性在增加,对亲友网络使用的下降速度也要快于正式就业者。但对正式就业者来说,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他对先赋性的亲友网络的使用并没有显著下降,只是对新建的企业内部网络的使用增多了。由此,假设 2 得到了证实。

在进入不同所有制企业工作的过程中,农民工对网络的使用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使用网络进入私有企业的比例只是国有和集体企业的 57%,外资企业是国有和集体企业的 51%,非正式就业则只是国有和集体企业的 33.3%。模型四和模型五显示,在利用网络获得企业信息方面,进入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农民工并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但对利用关系直接安排进企业来说,进入不同所有制企业则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对农民工来说,需要利用关系进入私有企业的只是国有和集体企

业的 68.7%，外资企业是国有和集体企业的 62.9%。以上说明农民工进入市场化程度不同的企业，其在求职方式的选择上是存在差异的。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市场化程度最低，因而需要农民工更多地通过网络的方式求职以及利用现有的关系网络直接安排进企业。外资企业的市场化程度最高，农民工可以更多地通过市场的方式进入这样的企业，而不需要利用关系网络直接安排进企业。由此，假设 3 得到了证实。

模型三的结果还显示，不同的工种对网络使用上的差异性具有显著作用。技工通过内网络求职的比例是生产工、一般普工和服务员的 1.26 倍，企业管理人员则是生产工、一般普工和服务员的 1.67 倍。模型四和模型五显示，企业管理人员在求职过程中利用关系获取企业信息比例是生产工、一般普工和服务员的 1.48 倍，利用关系直接安排进企业的比例则是生产工、一般普工和服务员的 1.33 倍。但企业管理者利用亲友网络求职则相对较少，模型二的结果表明其求职过程中利用亲友网络的比例只是生产工、一般普工和服务员的 74%。以上说明，作为企业管理者的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更多的是通过新建的内部网络去求职，并力图通过关系网络来获取企业信息并直接安排进企业的。作为生产工和一般普工的农民工则更多的是通过市场的途径求职的。

模型三、模型四和模型五的结果显示，农民工是否参加工会对网络使用的差异性具有显著性的作用。没有参加过工会的农民工使用内网络求职的比例只是参加过工会的农民工的 58.1%；利用网络获得企业信息比例只是参加过工会的农民工的 52.7%；利用网络直接安排进企业的比例只是参加过工会的农民工的比例的 61.3%。

五、进一步的讨论

农民工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并没有减少对社会网络的使用，减少的只是对先赋性的亲友网络的使用，但与此同时却增加了对新的以业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的利用。这与林南等学者所认为的随着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而建构的社会关系会越来越重要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而与部分学者认为农民工在职业流动过程中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市场的途径求职(刘林平、万向东等, 2007)的研究结论是相反的。有部分学者认为，随着市场化的不断进展，在劳动力市场制度得到确立后，网络机制(社会资本)在农民工求职过程中的重要性将不断下降，市场机制作用

开始突出(赵延东,2001;王毅杰、童星,2003),本文的研究并没有证明这样的结论的正确性。农民工在职业流动过程中掌握了更多的用工单位的相关信息,积累了更多的工作经验,可以说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是在提升的,这也有利于他们更多地通过市场的途径获得职业,但现实的情况是,农民工在获得职业的过程中仍然重视对社会网络的使用,只不过所使用的网络经历了从先赋性的亲友网络向新建的社会网络的转变。倪志伟(Nee,1989)认为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市场改革越深入,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就越重要。对于在劳动力市场求职的农民工来说,在市场改革的过程中,可能并不仅仅是人力资本对求职越来越重要,社会资本的作用可能也是越来越重要,特别是新建的企业内部的社会网络。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本身并不是互斥的关系,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两者都有可能变得更加重要。

本文进一步的研究结论是,非正式就业者比正式就业者在求职过程中更少利用先赋性的亲友网络。由于非正式就业者无法建立以业缘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网络,因此只能更多地通过市场的途径求职。对于农民工来说,进入正式就业的劳动力市场,拥有一定的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本身就是一道必需的门槛。已有的研究已经证明了正式就业者比非正式就业者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吴潇雯,2007)。因此,对于缺乏人力资本和一定社会网络的农民工来说,只能逃离正式就业的劳动力市场,而进入非正式就业。另一方面,正是因为非正式就业本身的低层次性和边缘性,人们进入非正式就业市场并不需要依靠社会网络,这才导致了非正式就业的劳动力市场呈现较高的市场化特征。但对于正式就业的劳动力市场来说,正是由于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导致了求职者利用社会网络的差异性。由于国有和集体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因而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需要更多地利用社会网络;私有和外资企业由于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因而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可以更多地通过市场的途径。这与张文宏(2006)有关国有与集体所有制单位对关系限制较少、进入外资企业 and 人情资源的多少没有关联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同时也说明了 Liu 等人(2000)通过对主要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得出的不同性质工作单位其市场化程度差异的理论假设在对农民工这样的次级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中同样得到了验证。进入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农民工相对较少地通过市场的途径求职,这反映了“单位内部形

成内部劳动力市场,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人求职非常重要”(Bian, 1997)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仍在这类企业保持着,体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制度路径依赖与单位制的延续性,这与边燕杰等人对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单位制继续保持的研究发现也较为吻合。

华尔德(1996)认为,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¹以拥有控制权和分配资源为特征,造成了个人对单位和单位领导的严重的政治经济依附,以及在这样的制度中,通过组织中的个人行动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上下间的庇护依赖关系,因此而造就了企业内部紧密的人际关系。本研究发现,作为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在进入国有和集体企业工作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这种庇护依赖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企业内部,而且很有可能已经延伸到企业之外。当求职者在进入国有和集体企业工作的过程中,就需要利用在企业内部的一些关系网络,这种利用不仅在于获得信息,更在于可以直接安排进入企业,而国有和集体企业内部紧密的人际关系可能在求职者进入之前就已经决定了。

总之,市场转型理论中关于不同性质工作单位市场化程度对求职的影响对处在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求职的影响同样是存在的。通过对主要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所得出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所体现的“单位制”特征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并没有衰落、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延续的结论,同样适合对次要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的研究。农民工进入国有企业工作,同样需要依靠社会网络,同样需要寻求企业内部的网络,并得到庇护。

参考文献

- 边燕杰、张文宏. 2001. 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 中国社会科学 (2).
 蔡昉、都阳、王美艳. 2005. 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 北京:商务印书馆.
 曹子玮. 2001. 职业获得与关系结构——关于农民工社会网的几个问题[G]/柯兰君、李汉林,主编. 都市里的村庄——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华尔德. 1996. 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

1 当时单位制的企业性质基本上都为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因此华尔德关于单位制内部紧密的人际关系这一论述也可以当作是国有和集体企业内部所具有的关系。

[M].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李春玲. 2006. 流动人口地位获得的非制度途径——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之比较[J]. 社会学研究(4).

李汉林. 2002. 关系强度与虚拟社区——农民工研究的一种视角[D].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民工流动:现状趋势与政策”研讨会论文.

李汉林、王琦. 2001. 关系强度作为一种社区组织方式[G]//柯兰君、李汉林, 主编. 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李培林. 1996. 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地位[J]. 社会学研究(4).

李培林, 等. 2000. 就业与制度变迁——两个特殊群体的求职过程[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刘精明. 2006. 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与人力资本收益[J]. 社会学研究(6).

刘林平. 2001. 外来人群体中的关系运用——以深圳“平江村”为个案[J]. 中国社会科学(5).

——. 2002. 关系、社会资本和社会转型——深圳“平江村”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林平、万向东, 等. 2007. 制度短缺与劳工短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卢汉龙. 1997. 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就业渠道的转变:从求职过程看中国市场化变化的特征[J].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

渠敬东. 2001. 生活世界中的关系强度——农村外来人口的生活轨迹[G]//柯兰君、李汉林, 主编. 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单菁菁. 2007.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变迁[J]. 城市问题(4).

万向东. 2007. 农民工非正式就业的进入动机、条件与效果——广州市非正式就业农民工调查[D].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办“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城市农民工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

王成斌. 2004. 农民外出就业:乡土社会网络的困境和制度化路径的作用[J]. 学海(6).

王春光. 2003.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G]//李培林, 主编. 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奋宇、赵延东. 2003. 流动民工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G]//李培林, 主编. 外来工——中国进城外来工的经济社会分析.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汪和建. 2006. 自我行动的逻辑——理解“新传统主义”与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J]. 社会(2).

王毅杰、童星. 2003. 流动农民职业获得途径及其影响因素[J]. 江苏社会科学

(5).

吴潇雯. 2007. 农民工职业流动后就业类型分化的影响因素分析[D]. 中山大学社会学硕士毕业论文.

武中哲. 2007. 双重二元分割:单位制变革中的城市劳动力市场[J]. 社会科学(4).

袁方,主编. 1992. 劳动社会学[M]. 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

赵树凯. 1998. 纵横城乡——农民流动的观察与研究[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赵延东. 2005. 如何测量社会资本:一个经验研究综述[J]. 国外社会学(2).

——. 2001. 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与再就业[D].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张文宏. 2006. 社会网络资源在职业配置中的作用[J]. 社会(6).

郑路. 1999. 改革的阶段性效应与跨体制职业流动[J]. 社会学研究(6).

Bian, Yanjie .1997.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Connection, Bridge, and Job Search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336 - 385.

Bian, Yanjie and John R. Logan.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739 - 758.

Bian, Yanjie. and Soon Ang .1997. "Guanxi Networks and Job Mobility in China and Singapore." *Social Forces* 75(3).

Fevre. 1992. *The Sociology of Labor Markets*. Hertfordshire : Harvester Wheatsheaf.

Granovetter, Mark. 1974. *Getting a Job: 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Getting a Job* (Secon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in, Nan, Walter M. Ensel, and John C Vaughn. 1981. "Social Resources and Strength of Ties: Structural Factors on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4).

Lin, Nan. 1982.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edited by Pand V. Marsden and N. Li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iu, Pak-Wai, Xin Meng and Junsen Zhang. 2000. "Sectoral Gender Wage Differentials and Discrimina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Chinese Economy." *Journal Population Economics*(13).

Victor, Nee.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663 - 681.

责任编辑：劳 勤